

那些用双手温暖石炭井矿区的女性

在遥远的西北边陲，有一座名为石炭井的矿区，它曾因煤而兴，汇聚了10多万矿工和他们的家庭。当人们铭记和怀念那段辉煌岁月时，往往将目光投向矿井深处挥洒汗水的矿工们，却容易忽略另一群同样伟大的创造者——那些随丈夫千里迁徙而来的矿工妻子们。

她们大多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却在贫瘠的环境中，用最朴素的生存智慧，书写了一曲属于女性的生命赞歌。

她们来自江南水乡的烟雨小巷，来自齐鲁大地的麦田村舍，来自天府之国的麻辣街巷，为了爱情与责任，告别熟悉的故乡，来到这片风沙漫天的土地。初到石炭井，纤纤玉指要适应粗糙的煤渣，细腻的肌肤要承受干燥的沙尘，柔弱的双肩要扛起陌生的生活。

然而，正是这群看似柔弱的女性，用惊人的韧性，在这片粗犷的土地上，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生存艺术。

当时粮食定量供应，她们便在贫瘠的土地上开辟出一小块菜地；副食紧缺，她们就圈养几只鸡鸭填补营养空缺。最令人动容的，是她们用简单的食材创造出“风味地图”——

张阿姨的四川辣酱，一碗细面几颗葱花，红油透亮，辣得地道；姜大娘的山东大酱，蘸着大葱配馒头，质朴而饱满；梁姨的泥鳅面，汤浓面滑，鲜味十足，让人放不下碗；陈大娘精细的上海煎蛋饺，薄薄的鸡蛋皮裹着荠菜肉馅，是江南的精致与现居荒原地的完



(资料图片)

美结合。

这些不同风味的菜肴，不仅维系着一家人的温饱，更成为维系矿工们精神纽带的重要符号。一口家乡味，解了千里愁，这或许就是她们最朴素的智慧——用味觉的记忆，抵御生活的艰辛。

上世纪90年代，当全国煤炭滞销与三角债的阴云笼罩石炭井，矿上数月发不出工资，只能定量发放米面油时，这些女性的智慧与坚韧达到了极致，成了最精明的“家庭经济学家”。

她们懂得如何用有限的米面，搭配自己种的蔬菜，维持一家的基本营

养；她们知道如何将一只鸡的价值最大化——鸡蛋供给下井的丈夫，鸡肉留给孩子，辣炒鸡杂，鸡汤面，鸡毛收集起来做毽子、做手工给孩子们娱乐；几家合伙购置一套下水，清洗干净，这里就会有羊杂菜，还有烩羊杂等等，都成了美味。

她们的“经济计算”不是写在纸上的公式，而是融入一日三餐的生存本能。

石炭井的辉煌，一半在矿井下，一半在井上。

矿工们开采出黑色的能源，而这些

女性则构建了矿区的生活脉络。她们虽不参与煤炭生产，却是矿区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支撑者。她们养育的下一代，有的成为矿区的技术人员，继续为国家能源建设贡献力量，有的走出了石炭井，走出了大山，走向更远的地方。

曾经有一部电影叫《九香》，讲述了一位母亲在极端困苦中抚养孩子的故事。石炭井的女性们，正是无数个“九香”的缩影。

她们的爱像煤一样，看似粗糙，却能燃烧出持久的温暖；她们的生命如矿井深处的支撑木，默默承受重量，保障着整个家庭的安全，母爱如煤般平凡而伟大。

作为70、80后的母亲，她们在计划经济的余晖与市场经济的曙光之间，经历了最为艰难的转型期。她们或许无法给孩子讲解复杂的知识，却用行动教会了下一代什么是坚韧、什么是创造、什么是在困境中开出花朵的智慧。

随着资源枯竭，石炭井正经历转型，但那些女性用双手创造的温暖记忆，却像煤一样深埋在这片土地之下，随时可以被回忆点燃。在歌颂矿工的奉献时，我们也记住这些石炭井的女性——她们是妻子，是母亲，是异乡的扎根者，是匮乏年代的创造者。她们的智慧与坚韧，与地下的煤炭一样，都是石炭井这片土地最珍贵的宝藏。

(转载于今日头条“公园野餐拍”)

陕甘宁边区 人民法院的红色档案

轻薄泛黄的草纸，粗细有据的线格，隽秀流畅的毛笔行楷，粗边篆文的红色方印……这份落款盖着马锡五院长、乔松山副院长印章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第二六八号“批复”，是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保管档案中的“宝贝”之一，虽历经70多年的岁月洗礼，其字里行间依然闪烁着“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光芒。

这份“批复”“事由”是“为批复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讨论通字第三号通知的意见”，答复对象是“肖兼、李副院长”，下方是红色方形、从右往左三行竖刻篆字“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印”。因文稿前后均无时间标记，结合有关资料推测，该“批复”应该制发于1949年11月初。当时，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是西北五省区司法领域最高领导机关和最高审判机关。据《宝鸡市法院志》记载，1949年7月14日宝鸡解放，7月24日奉宝鸡市军管会命令成立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即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前身），院长由市长肖蓼兼任，副院长为李福元。

1949年10月4日，李福元签发了呈送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的“意见”，其以9页正文就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婚姻、烟土问题，卖壮丁费及壮丁垫款问题，债务利息问题的立场原则、具体做法等详作报告，还列举了几个“典型案例”。随后，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的“批复”中充分肯定了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的钻研精神及将自己的意见向上级提出的观点”的做法。当时，成立2个多月的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级法院的“通知”不但组织开展了认真的学习讨论，而且结合自身办理案件的实际情况，有理有据、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梳理、总结，并专门向上呈报。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大力弘扬的。

“批复”还对两类案件的办理进行了答复：关于“烟毒案件”——“据闻近来有从敌区向解放区贩卖鸦片者，你院距离待解放区较近，以后审理这类案件应特别注意，如查明确从敌区贩卖烟毒来解放区出卖家者，非但其毒品没收，人犯亦应科以相当刑罚，因其行为在本质上是帮助敌人的。”当时宝鸡地区解放仅仅2个多月，边区人民法院特别就“烟毒案件”的处理提出意见。在解放初期，各地区社会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必须从肃清敌特反革命分子、依法保障人民权益、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等党和国家大局出发，在一个个案件的办理中弘扬新风正气、捍卫新生政权。

关于“债务问题”——“像报告中所述‘挂羊头、卖狗肉’的铺子，主要靠高利剥削，而不是靠经营商业的利润，那就是‘放账铺’可按高利贷剥削处理。不过研究是否高利贷要具体来看，不能把多少放一点账的铺子，都看成‘放账铺’……”陕甘宁边区《刑法总则草案》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了“重利罪”，即“以金钱或其他物品贷人、收取与原本显不相当之重利者，处3年以下强制教育、劳役或并科1000元以下罚金。以犯前项之罪为常业者，处5年以下强制教育，得并科3000元以下罚金”。当时的“强制教育”是紧列“死刑”之后的主刑，可见对“放账铺”的惩处之严格。因此，“批复”提出“是否高利贷要具体来看”，可以“把多少放一点账的铺子”按“一般债务”处理。这样，就能分清主次、抓住本质，避免“一刀切”和打击面过大，做到“罚当其罪”、惩恶扬善。

室藏档案只有“活”起来，才能更好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独特作用。如今，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室藏档案已完成数字化扫描10余万卷，一份份电子档案正为涉诉群众和有关办案单位提供着及时便利优质的服务，包括第268号“批复”在内的陕甘宁边区时期法院档案资料，是我们赓续红色法治血脉、传承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践行司法为民、履行公正司法的宝贵财富，值得悉心研究并发扬光大。

(据《宝鸡日报》)

陕甘宁边区的民主变革

“三三制”政权形式确立以后，随着陕甘宁边区的政治民主不断深化，无论是党的领导，还是民众的要求，都出现了新的需求。这种变化最先从基层代议机关——乡参议会的改革开始。基于“议行合一”的考虑，1944年，谢觉哉起草的边区第二届二次参议会的报告中，首先提出将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大会。同年12月1日，毛泽东就这报告给谢觉哉的回信中说：“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请你和其他同志商量一下。”

12月2日，出于谨慎，毛泽东再次致信谢觉哉，说：“参议会改名，关涉各解放区，中央尚未讨论，请暂不提。”到了1945年9月，边区进行了第三次普选，延安新市乡群众在试选中提出：将乡参议会改为乡人民代表大会，取消行政村长制，由各行政组选民依人口比例选出代表领导小组，再由他们组成乡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乡级政权的权力机关，就可以真正做到“议行合一”。这个建议得到边区参议会常委会和边区政府的肯定。李维汉考察了新市乡试点的乡选，同样认为“乡参议会实质就是乡人民代表大会”。

基于边区民众的要求，以及党内多位领导人的建议，经中共中央批准，1945年10月5日，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关于今年乡选工作致各专员县市长的信”正式作出了乡参议会改名的决定，信中说：“过去乡参议员只管议事，不管执行，仍然是议行分立，造成不少困扰。边区参议会常委会和边区政府已经决定改乡议会制为乡人民代表大会制，以纠正这个缺点。”自此，在乡一级的层面，边区参议会开始改称人民代表大会，并履行议事、执行的双重职能，开会时是乡人民代表大会，休会时则为乡政府——乡政府委员会。

1945年10月14日，边区参议会驻会委员会和边区政府发布联合通知，更明确了乡参议会的改革：“为了发扬民主，加强乡村自治，改乡参议会为乡(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各代表一方面代表居民意见解决本乡应兴革事项及选举与罢免乡长等立法职权，另一方面又代表乡政府领导所属选举单位居民，推行各种建设等行政事宜。为便于人民选举自己所熟悉的人为代表，并便于代表领导居民推行工作，乡市选举区域，一般改为自然村为单位。”

1945年普选中这一局限于“乡参议会”的变革，并不只是表现在名称的改变上，而是发生了民主实质性的变化。例如候选人的提出，不再要求“十人连署”的规定等，都扩大了人民自由选举的权利，提高了民主程度。

(据中国组织人事报新闻网)

石城之战

石城之战，是明朝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发生在今西吉县境的又一次重大战事。时震朝野，影响后世。

元末豫王下属把丹任元平凉万户，“雄长西陲”。明洪武初，徐达、俞通海西征逐豫王，把丹率众归附，官平凉卫正千户，部众数千被编为民，仍号“土达”。把丹令孙满俊(行四)，人皆以“满四”称之。世居平凉府开城县固原里满家营。家产殷富，以强力称雄于诸族，有众数千人，皆骁勇善骑射，平素扶危济困，仗义疏财，在当地土达、回、汉、蒙古等各族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

明成化三年(1467年)，固原守将“髡御失德”，横行乡里，唆使官府衙役掠夺土达马匹鹰翎等物，捕其首领，激怒土达。成化四年(1468年)4月，首领满俊、李俊号集诸土达及隆德、安定(今定西县)杂居军民数百人，劫官府苑马寺后，揭竿造反，聚众盘踞石城(今西吉县火石寨乡窑村)。相率尊称满俊为贤王，李俊为顺理王。满俊部署帐下，以火四、火能为腹心，马翼、南斗为股肱，咬歌、保歌为爪牙，满能、满玉为羽翼，组成义军领导核心。

义军伐木结栅，牛羊做帐，并在石

城周围的炮架山、七里宝山、将军山、照壁山等峻峰布防设卡，于要道处设置滚木礮石为障。义军初聚数百，旬日千余，半月之间，拥有4000余众，披甲执锐，与明军对峙。

义军主动出击甘州卫、固原千户所，明军参将刘清自靖虏来援，中义军伏击溃逃。义军顺理王李俊不幸阵亡。刘清惨败消息传至陕西，镇守太监刘祥慌忙与巡抚陈介、宁远伯任寿会商，即令军都指挥邢端、申澄率部讨伐。义军再与明军战于石城之下。义军将士奋勇迎敌，丢盔弃甲，军资尽丧，大败而逃。是役，明军用缴获武器装备自己，军威大振，民无业者多从之，不到月余聚众数万。

5月，明廷亲令陈介、任寿与宁夏总兵广义伯吴琮、巡抚延绥都御史王锐、参将胡恺等分率各路兵马计3万众会讨石城，屡战失利。

7月，明廷又勒令太监刘祥为监督，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项忠为总督军务，刘玉为总兵，伏羌伯毛忠为副总兵，大理寺卿马文升为指挥，参将夏正等率京营及三边七郡马步精兵5万余众奔石城讨伐。

10月初，项忠、马文升率先后到



大石城。(资料图片)

达固原，兵分七路围攻石城，百战未能攻克。是役，毛忠及其次子毛海、孙毛铎皆败死；平虏副将刘玉中矢负伤，指挥申澄、周玺亦败死。项忠道：“贼自叛逆以来，前后大小300余战，杀我一伯、三指挥，官军死者数千人。”

11月，明军“募得‘敢死士’数千，密间谍，出奇计，断其水道，蟠其积

聚”，在义军“城中食尽，人马多渴死”的困境下，始得克平。义军被杀7000余人，被俘2000余人，满俊及其家眷等200余人被解送京师伏诛。城破后，义军余部在满能、毛哈喇等率领下分头突围慧帚山、青山洞一带，继续坚持斗争，直至次年正月十四日，遂告失败。

(据《多彩西吉》)

马文良烈士使用过的油灯



马文良烈士使用过的油灯。

宁夏博物馆收藏着一盏马文良烈士使用过的油灯，它见证了马文良在盐池县开展革命工作的斗争历史以及马文良英勇就义的感人事迹。

马文良，辽宁省海城县(今海城市)海城镇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马文良组织发起“延安回民救国协会”，10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任命马文良为三边回民巡回团中共特支书记兼团长，派其前往定边、盐池等边区工作。1941年2月，马文良来到盐池县的回六庄开展革命工作。回六庄由六个回民村庄组成，是盐池县主要的回民居住地，距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惠安堡仅有38里，是国共双方的必争之地，革命斗争异常尖锐。马文良到达回六庄后，白天进庄入户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晚上点油灯教老乡识字，为了节省灯油，每次他都只点一根灯芯，这样灯油就能多用2天。

马文良的到来，被暗中观察的特务知晓，引起了国民党盐池县政府的恐慌。1941年2月20日，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派出驻扎在海子井的特务连包围了强记滩，马文良等人不幸被捕。4月17日深夜，马文良、崔景岳、孟长等有3人被国民党宁夏当局活埋于银川城隍庙，马文良年仅29岁。

马文良年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他用过的油灯被陈列在宁夏博物馆“红旗漫卷”革命展厅中，向人们讲述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光辉斗争历史。

(据“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老银川的洗澡堂

1925年，由北京籍人士蔡青山在原新华街灯光球场处开办了第一家浴池——清华池，结束了旧银川没有浴池的历史。蔡青山成为旧银川第一浴池的老板后，投资购置小锅炉、简单修建了可容纳20多人的浴池，但由于浴池设施简陋、洗澡环境差，来澡堂洗澡的人不多。清华池经营2年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经营出现亏损，1927年冬，蔡青山看到浴池无钱可赚，便将清华池低价转卖给一个叫马子才的商人。马子才经营浴池一段时间后，经济效益仍不见好转，遂将浴池又租给常登第，常登第把清华池改名为第一池。第一池在常登第的精心管理下，不断改善澡堂环境并添加服务项目。为了加强浴池的成本管理，常登第还设专职会计1人，使来往账目清楚、收支透明，浴池经济效益逐渐好转。然而，马子才看到常登第经营的浴池进账不少，便收回浴池经营权，转租借给他人经营，又改名为中华池。

常登第由于经营浴池有方，积累了一定的资金，1933年又另起炉灶，在原银川市乳制品厂位置新建一处浴池，仍叫第一池。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今步行街同福大厦处，马子才创办了另一家玉清池(原银川浴池)。1939年2月，正值春节，日本军队的12架飞机从城东俯冲而过，炮弹、机枪在新华东西街狂轰滥炸。玉清池也遭日本飞机轰炸，剩下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大池、座位和锅炉全部被炸毁，只有女浴池未受损失。员工们看到苦心经营的玉

清池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毁于一旦，都匍匐在浴池废墟上失声痛哭。随后，玉清池经过重新修缮，又重新开张营业。

1949年银川解放时，银川市只有2家浴池，即第一池和玉清池。1950年，第一池改名为永义池。同年，永义池由宁夏公私合营企业公司接管。

1953年，永义池与玉清池合并，称永义池，并由原址搬迁至今步行街同福大厦位置。由于银川城市人口不断增加，洗澡成了银川人的一大难题，为了解决银川人洗澡难的问题，中共银川市地委、专署发出倡议，号召银川市各机关干部踊跃集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募集齐了修缮资金。银川地委用这批修缮资金将永义池进行扩建和翻修，使其成为银川市唯一一家大型浴池。重建后的浴池无论从营业面积、服务设施还是环境卫生等方面都比过去上了一个档次，基本满足了银川人的洗澡需求。随后，永义池改名为人民浴池。

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包兰铁路在银川接轨通车，促进了宁夏及银川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京、津、沪、杭等地大批有志之士来银支援宁夏建设，新城地区城镇人口成倍增加。原新城无一处浴池，新城地区的干部、工人、教师为洗澡往返10多公里到老城区。为解决新城地区广大群众洗澡难的问题，银川市商业局积极筹措资金，于1965年建成了新城浴池，缓解了银川浴池洗澡排队的紧张状况。

(据银川档案方志网)